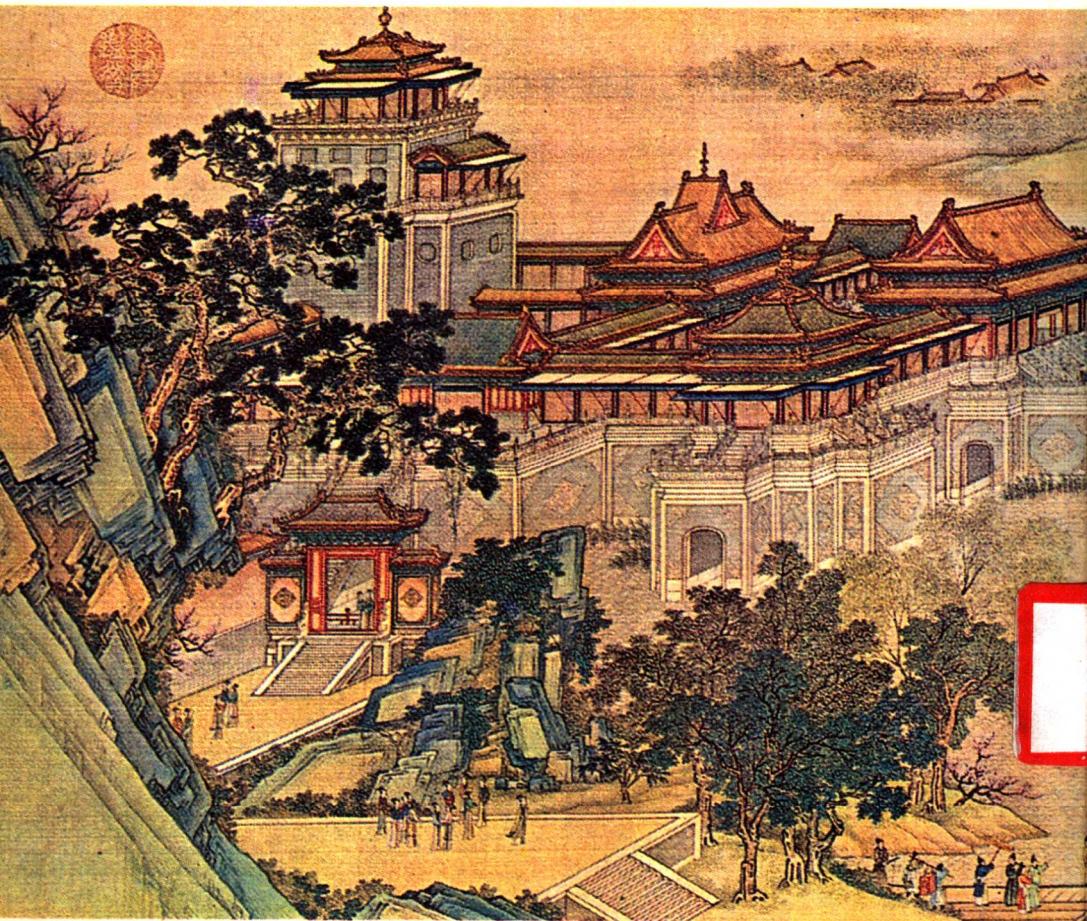


漢學論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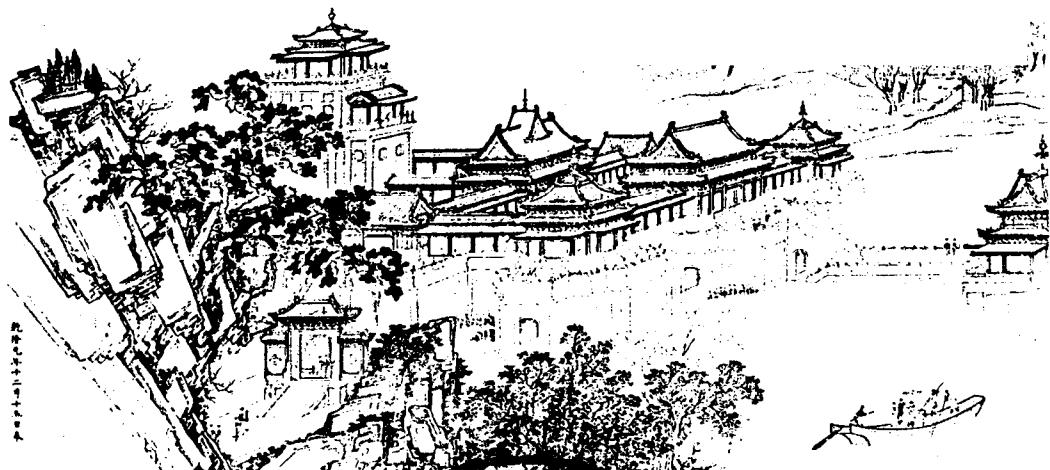
(366)

國立政治大學中學系文中文編主所研中



漢學論文集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文系主編
中國研究所



漢學論文集

主編者：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所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一六九九五號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八

實價新台幣二〇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漢學論文集 目 次

中華文化與民族前途……	尉天驥……	一
社會變遷中的知識分子……	黃景進……	一七
通經致用的再出發……	周浩治……	三五
尚書費誓篇作成時代的再檢討……	李振興……	六五
司馬遷撰寫史記的動機……	黃俊郎……	七七
魏晉之際名教與自然……	呂 凱……	九三
研究文學的六層樓理論……	游信利……	一〇一
就文心雕龍神思篇談漢賦的欣賞……	簡宗梧……	一三九
話本的演變……	侯志漢……	一四九
徐霞客遊記漫談……	喬衍璫……	一七三
晚明小品文蔚盛的原因……	耿湘沅……	一九一

從赤子之心到主觀的詩人——人間詞話讀後	黃志民	二一五
中國神仙信仰的形成與談仙文學	李威熊	二三三
敦煌變文中詩歌形式之探討	羅宗濤	二四九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碩士畢業論文一覽表		三〇七
編後記		三三三

中華文化與民族前途

尉天驥

中國統一與世界和平

近來，人們都在關心着中國的統一問題。這個問題所以受到重視，不僅因為它關係着中國的前途，同樣的，它與整個的世界和平都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因為「三十多年來，西方以科技爲主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已慢慢發現很多的弊端；雖然它有很多正面的結果，但往往因爲負面的結果常是長遠的。西方的發展模式視人爲物，視自然爲剝削的對象。因此在這種發展模式下，人與自然遭受了很殘酷的摧殘，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疏離惡化，使國與國之間敵視對抗，自然環境迭遭破壞，自然資源逐漸匱乏，在瘋狂的軍備下，把世界一步一步帶入全面核子大戰的危機。可是，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似更無法解決問題，且有愈來愈嚴重的趨勢。今天，在西方，在社會主義國家，在第三世界國家中，有識之士正積極的尋求另一不同的發展模式，避免生態的危機、資源的匱乏，及世界大戰的人類惡運。這個新的發展模式要有什麼樣的特徵呢？第一，它能夠解決各地區人民基本食衣住行育樂的需求；第二，它能夠觸發各地區人民的內在潛能，根據自己的環境及文化傳統發展出一個自

主的生產及分配結構；第三，它能夠愛惜、保護及妥善經營四周的環境，使自然資源能夠持續不斷的更生利用；第四，它能夠促成各地區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結構的轉變，使大家都參與、發揮及受益。假如今天世界上有一個國家在文化上、資源上、意志上及經驗上能從西方的發展模式脫穎而出，建立一個新的模式，不但使自己的發展符合全民的意願，而且使第三世界有一個新的希望，世界有一個選擇的模式，那就是中國大陸和台灣了。」（引自「關於中國前途、環境污染問題的討論會」林俊義發言，中華雜誌第二〇五期）。這樣，中國統一的問題不但是一個政治、經濟、社會的問題，更是一個文化的問題了。

談到文化的問題，我們就不能不對鴉片戰爭以來的新文化運動作一回顧和反省，特別是五四運動，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去重新思考。我們都知道，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及由此而推展開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都是以愛國主義為基礎的。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軍閥的割據，以及它們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極端落後，無一不顯示出嚴重的民族危機，因此，藉着反對巴黎和會給予中國的不公平待遇，便引發出「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五四運動；為了檢討中國為何衰敗和如何才能使中國富強，以及應該把中國建設成一個怎樣的國家和給予人們怎樣的生活，便使人覺得不能不在文化上有嚴肅而深刻的反省和思考，於是隨着五四的愛國運動便產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換句話說，五四愛國運動是中國民族精神的一次偉大的顯示，而五四新文化運動則是此一精神的思考和實踐。

反省批判能力的喪失

然而，當我們一談到五四愛國運動這一精神的思考和實踐，六十多年來的悲痛現實已讓我們看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缺失。此一缺失是什麼呢？第一，是它對於西方文化的不了解。我們知道，五四愛國運動是由巴黎和會對於中國的不公平待遇引發出來的，巴黎和會是幹什麼的呢？那是用來解決第一次世界大戰未曾解決的問題。當時，我們的學術界或文化界如果能夠冷靜的去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所以爆發的原因，便必然會發現西方近代文化的種種問題。這樣在學習西方文化的時候便必然會有所選擇，有所批評了。無如，近百年來的落後與貧窮，已使我們喪失反省批判的能力，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梁啟超等人對戰後歐洲的考察（見他的「歐遊心影錄」）已隱隱約約感受到歐洲的戰爭和創傷不僅僅是戰爭的問題，更是文化的問題，也就是說，它與西方人的經濟、政治、社會結構、生活態度和方式，以及對人生對世界所懷抱的價值觀念，是有着因果關係的。但是，由梁氏等人的考察所引發出來的「人生觀論戰」（又名「科學與玄學論戰」）對於思考西方文化問題並沒有產生多大作用，而接續五四運動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便在西化道路上走上反民族主義的全盤西化。而更可笑的是：當我們的文化界高唱全盤西化之時，却正是史賓格勒出版「西方的沒落」、歐美人士感嘆着「危機」、艾略特把繁華的歐洲吟為「荒原」的時代，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一些知名的文化界人士竟然說出：「與其吸鴉片打麻雀（麻將）不如跳舞，與其崇拜道教佛教，不如信仰基督教」，甚至說出「中國文化

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比不上西洋文化。」（引自陳序經的「關於全盤西化答吳景超先生」）。

西方文化何以發展到近代便產生了表面繁榮內裏空虛和腐爛的現象呢？主要原因是由於它建築在追求利潤的消費制度之上，這樣，由於追求利潤便必然走上勢利主義的道路，而把人際關係陷於物質主義的泥淖之中。關於此，西方的思想家們已有很精湛的分析和檢討，史學家湯恩比即說：「西方人最近的發明，已將一種享有特權的少數和非特權的多數在世間財物上分配不平等的情形，從以往的不可避免的邪惡變為不可忍受的不公平。」這樣，便為虛無主義和共產主義製造了一個生長、蓄殖的溫床。可是，面對西方文化的日趨於非理性，我們當時的文化界竟然仍舊對之謳歌膜拜不已，謳歌膜拜之不足，竟掉回頭來大罵自己的祖先和文化，沒有一點靈性，說：我們弄成這個樣子，實在是自己的祖先造孽太多，因此我們應該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樣樣不如人，事事不如人，並且應該感謝帝國主義的侵略為我們帶來一些人道精神（以上均引自胡適言論）。從這種情況看來，我們民族的失掉自信心到了什麼地步不是很明白了嗎？

西化的遺毒

正由於這樣的失掉信心，所以中國傳統文化便遭到很大的誤解。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兩個產物，一個是學習歐美的全盤西化，一個是學習蘇俄的布爾雪維克化。全盤西化其實就是全盤美國化、全盤資本主義化——一切以美國為標準；關於此，這裡不妨引一段話來作說明；在美國老羅斯福總統時代，

他們伊利諾大學的負責人曾經對這位總統建言說：如果美國能夠早點透過教育、宗教、文化的力量來改變中國人成為黃皮膚的美國人，則中國的一切經濟、政治利益早就掌握在美國之手了。這個談話便產生一個事實，那就是他們將部分庚子賠款交給部分中國人（如胡適、梅貽琦），在中國從事建設美國文化的工作；這也就是近半個世紀以來的學術文化被扭曲的一個原因。何以說我們的學術文化遭到扭曲呢？蔣廷黻等人對鴉片戰爭的解釋、美國費正清對中國史的曲解，便是一個例證。

近百年來的中外戰爭應該從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分別而言，然而我們的一些歷史學者竟連這點分別也不注意，例如蔣廷黻氏就把鴉片戰爭的真正起因歸罪於中國未能充分理解十九世紀大英帝國之威力，而對大英帝國之殖民帝國主義有所譴責，由此而言，當時抗英的林則徐在他看來是不對的，主張屈辱和談的琦善反而是正確的。至於費正清，站在美國資本主義的觀點，他便認為中國要現代化（全盤西化的另一個名稱）必須排除障礙，這障礙便是孔子思想一類的傳統。而與此相對的，便是史達林對於中國歷史的認識，他由「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模式，判定中國舊文化都是封建社會之產物，於是在「反封建」的目標下，中國傳統文化當然都成了過時的東西，而到了「四人幫」時代，不但一些傳統文化是封建社會的產物，而且還成了奴隸主文化，如此，還不對之作全部摧毀的工作嗎？所以我們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不是把中國傳統文化看成走向現代化的障礙，就是把它當成封建社會之產物，二者不管走一條道路，都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之全盤否定。於是，在前人的經驗既無可取，個人的智慧又不足以提供自己一個可以追尋的道路

理之時，一股虛無主義的潮流也就自然而然地產生出來了。

從愛國到虛無

這種虛無的態度當然也有它的歷史因素。中國幾千年的帝王專制，特別是到了明代以後所形成的腐爛、恐怖和非人化的官僚集團，都使人對之產生強烈的憤恨；再加上科舉制度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摧殘、腐蝕，遂使得原本站在人道立場的傳統文化一變而成為罪惡之幫兇，這現象到了袁世凱時代的要成立孔教，更把中國文化抹了滿臉漆黑；徐復觀先生說過一句很沉痛的話：今天「最可怕的是：反傳統者反對的是傳統中最好的，而提倡傳統者却提倡傳統中最壞的，這樣便沒有文化之路可走。」（引自「中國文化的危機與展望」）。這種難局就使人對中國文化不能去作深刻的認識，因此也就無法建立對自己民族的信心，五四的愛國主義發展為民族的虛無主義，寧不可悲？

歷史是最好的證人，從五四時代到今天，人類已經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而且無數小型戰爭仍在進行。在這將近一世紀的演變中，當年的一些被壓迫的民族和國家雖然大多數已經表面上建立各自的國家，但是在列強經濟、科技、以及隨之而來的文化的優勢作用下，世界仍然被劃分為兩個層面，一面是富庶的工業先進國，一面是貧窮的農業落後國。這貧窮的農業落後國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第三世界或南方。工業先進國在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力量之下，論說應該把他們的國家建設成人間的樂園，但是層層不斷的問題却已為這些國家的發展亮起了紅燈，一九七二年羅馬報告「成長的極限」就警告

世人說：「如果世界人口、工業化、食物生產和資源枯竭的發展趨勢保持不變，則未來的百年之內，地球總有一天會達到成長的極限。最可能的結果是人口和工業生產能力二者都會出現一種突發的和不能控制的衰落。」而事實的演變似乎比這篇警告進行得還快，還不到十年，世界已每天在能源危機、人口爆炸、通貨膨脹、生態破壞、武器競賽、人心麻木等陰影下使人惶惶不可終日，所以，到了一九八一年，羅馬報告「未來在人類手中」公佈時，有識之士已經警覺到：人們如果不透過良知和文化的力量，進行徹底的改革，就無以擺脫即將來臨的悲慘命運。這些都使人認識到西方工業文明發展到今天已呈現出嚴重的非理性，違反宇宙生存原理和反乎人道而行。

二元經濟形態

然而，可惜的是：從工業革命以來，不僅西方國家拿這種不合乎真正進步的原則發展自己的社會，而且還使得這種發展方式成為落後地區發展的模式，這就是開發中國家經由西化的道路而要達成現代化的過程。於是，在典型的開發中地區便出現二元性的經濟形態，一面是百分之十五人口所集中的一兩個大都市，一面則是百分之八十五人口所散居的鄉村和小城鎮；而在其經濟體系的運作下，所有的建設發展差不多都投資在這一兩個看來顯眼的大都市上，而其餘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便隨之遭到遺忘或冷漠的命運。「此種二元性的經濟倘若不善加防範的話，將造成『相互毒害』的慢性自殺過程——城市工業發展的結果導致鄉村經濟結構的破產，而鄉村經濟破產之後，人口便大量往都市集中，使都市

發展完全失去控制。爲此，都市人口激增的結果不僅造成資源的大量耗損，而且農村的失業也就一變而成爲都市的失業問題。假如鄉村生活繼續瓦解下去的話，則不管再付出多少投資也是無濟於事的。」（引自舒瑪赫「美麗的小世界」）。至於由此而產生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道德淪喪……等等，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了。難怪舒瑪赫在作過如此的分析後說出：

「現代科技所追求的方向——不斷地朝着更大的體積、更高的速度、更猛烈的暴戾之氣而無視於自然和諧的一切原則——乃根本違反了進步的原則。目前此種盲目發展的結果，已顯示着它已開始破壞了我們生存的根基，在此種情況下，我們應該重新釐定新指向，使我們的生活型態趨於人道化。

這種檢討，便使人不能不對工業文明以外的文化作一考察，杜佛勒（A. Toffler）的「第三波」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按照他的說法，人類的社會經濟生活曾經兩次大革命，第一波的革命是農業革命，第二波的革命是工業革命。而由於工業化自身產生了它自身的乖離，破壞了人類的生存法則，於是即將來臨的將是綜合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而又超越其上的第三波文明。而在這即將來臨的第三波文明快要推展開來之時，農業文明更有彌補工業文明缺陷的用處。特別在科技主義所產生的問題已經無法再以科技解決時，農業文明中被保存得最完整的中國文化，更顯示出它的價值。

這些價值主要的有哪些呢？我們綜合中外學者（如李約瑟、舒瑪赫、克拉克、奧佛斯、方東美、宗白華、熊十力、梁漱溟等）的意見，主要是可以有下列幾點：

中國文化的價值

一、萬物一體的胸襟：爲了方便，這裏我想引用宗白華先生的一段話，他說：「因爲中國人由農業進於文化，對於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親和的關係，沒有奴役自然的態度。中國人對他的用具（石器銅器），不只是用來控制自然以圖生存，他更希望能在每件用品裏面表出他對自然的敬愛，把大自然啟示着的和諧、秩序、它內部的音樂、詩、表顯在具體而微的器皿中。孟子說：『君子上下與天地同流』，中國人的個人人格、社會組織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爲形而上的宇宙秩序與宇宙生命的表徵。」這點正可彌補西方文化，特別是工業革命以來所產生的「人」與「物」對立而至於互相破壞的現象。近日出現的一些有關生態學的著作，對它更有很細緻的說明。

二、性善論：法國思想家馬利當和德國思想家雅士培會分析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虛無狀態，認爲其主要原因便在於今日的西方人不認爲宇宙間的事物中有着必然的秩序，從而也就認爲歷史的發展沒有必要可循；於是在把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視爲「偶然」之時，一種非理性的宇宙觀和人生觀便隨之出現在世人的生活中（有一本討論人的存在問題的書就叫做「非理性的人」），這樣正如雅士培所說，在人們一面以有限的生命面對無限的人生；一面是無法在生命中有肯定的時候，他便可以做出任何事，甚至殺人和自殺。但是，在中國文化中，人們是把宇宙的秩序和歷史的演進都看成是和諧而朝着至善之境前進的，甚至荀子也肯定着人生是朝着理性的方向發展的。這種人生態度對

於西方社會的日趨於極端的爲我主義是有着健康的意義的。

三、更生的觀念：舒瑪赫會說過，西方社會目前的求財之道根本上是違反宇宙生存原理和反人道而行的，他認爲西方今天的經濟學雖流派甚多，但歸納起來都是所謂的「耗盡經濟」，這種經濟是把人的社會價值安置在他每天的消費量上，誰買得起別人買不起的東西，誰就在社會上爲人稱羨。這樣下來，經濟學實際上就是消費學，凱因斯雖然主張「以消費促進生產」，其結果仍因目的在鼓勵人們追求過多不必要的消費，而使得他所說的「生產」變成「消費」。能源之日趨於枯竭，這是最大原因。面對這種現象，西方有識之士便提出另一種「更生經濟」的觀念，認爲經濟應以「生產」爲主，這種生產要求人類對於宇宙的資源永遠保持、增加、繁殖不息下去；這種情況就像耕種土地一樣，一粒種籽必需生殖出更多物品出來；無疑的，這是與中國傳統的「生生不息」的經濟觀念一致的。

四、自由精神：西方文化由於受到科技主義的影響，遂使得人們視大千世界爲一有限的、物質的、機械秩序，於是在這有限的、機械一般的世界中，人的一切都受到客觀現實的影響，沒有多大發展的可能，這樣的人物便只有在各種不同形式的宿命論中感傷唏噓，而日益減低其創進不已的意志了。這也就是西方社會充滿慾望和對人生無可奈何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文化不僅重視人的現實面，更重視人們能不能透過現實的有限面向無限的精神層面發展，特別是中國的藝術，它所給予人的不僅是現實面的反映，更透過精神活動在這現實面上創造出另一世界，使人們可以從有限的領域進入無限的領域；這種不拘於限制的企求便使得原本扁平的人可以轉變成爲立體之人，可以創造，可以發展；正由

於有了「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意志，在「知其不可而爲之」的情況下，世界才能從一宿命的機械秩序中顯示出無限的、永遠不已的生機。

五、義利之辨：今天西方世界，甚至第三世界都在物慾瀰漫下失掉生命的理想；索忍尼辛對美國的批評就是一個衆人所知的例子，在這種情形下，人們的生活便必然在追求「利」的目標下而陷於勢利主義的泥淖，這是社會上道德低落的原因。今天我們想要這個社會走向公平、合理、和諧而又互相尊重的道路，首先要做的便是打破目前的消費社會的倫理關係。中國文化中，無論大學和孟子，都以義利之辨爲主；懷抱「仁民愛物」的倫理精神；老子也高揚「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的精神，甚至連英國人李約瑟都看出中國傳統科技中有「精神存在，那就是以「人」爲主，而不是以「物」爲主。我想，如果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都能認清何者應該做、何者不應該做，而不至於只求目的不擇手段，或者認爲「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則人文世界的建立才有可能。

以上我們簡單的舉了幾點用來說明中國文化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幾千年來一直維繫我們這個民族使之不致於癱瘓的力量，也是我們這個民族所以歷久不亡的原因。我們也知道，面對一個人口如此繁多，問題這麼複雜的社會，不但讀孝經不能讓黃巾撤退，甚至僅用一套四書五經也不可能馬上讓中國富強，然而，透過對這些文化遺產的反省、揚棄，引進可爲我用的西方文化，建立正確的人權法治觀念，加上近一百多年來的慘痛經驗，我們至少還可以探索出一個屬於中國人的道路，有了道路，有了理想，大家的智慧才能結合在一起，形成力量，否則盲人瞎逐，一會兒美化、一會兒俄化，甚而一

會兒香港化、新加坡化，（民國二十年左右不是還有人主張學習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嗎？）我們的民族還要摸索到哪一天呢？人有做人的根本，國家有國家應該走的道路。五四新文化運動曾提出「科學」和「民主」的口號，這是很合乎中國需要的。但是，如果沒有健康的文化環境，它們又由何建立呢？我們希望經過近百年的摸索和痛苦經驗，中國人能夠獲得真實的教訓。

從新思考民族的道路

鴉片戰爭以來，人們不斷提出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然而就中國現實演講來說，這種努力顯然還沒有達到大家所期望的目標。國家的處於分裂狀態和一波一波不斷湧來的民族危機都令人覺得非重新思考民族的道路不可。但是可惜的是，他們多着重於西方文化之學習，而很少思考當時的民族處境，尤其沒有注意到由落後國家邁向今天西方先進國家過程中所具的矛盾，更沒有思考過：一、當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到今天產生如此巨大的弊病，甚至積習難返的時候，衡量它所產生的得失利弊，則那原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中國社會有無發展資本主義之必要？二、在先進國掌握科技、經濟與利益的情況下，中國能不能發展出資本主義的道路？舒瑪赫即曾說過這樣的話：「適合於富裕地區的生產方法、消費標準、成功標準、價值系統、行為模式等倘若一成不變地翻版到貧窮國家之後，將使貧窮國家對富國的依賴性更為增加；這方面最明顯的例證及病狀乃是——它促使貧窮國家不斷地負債。」而蘇俄所推行的一套所謂的「社會主義」，表面看來它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實際上其對社會、經濟等問題